

改革・反改革

康有為與袁世凱

(四)

● 孔祥吉

慈禧榮祿惶惶不安

一八九八年戊戌八月上旬，形勢一天比一天嚴重。康有為所提出的保薦袁世凱及聯結與國的方案，非但未能緩和局勢，反而加快了慈禧、榮祿等守舊勢力策動政變的步伐。他們密謀策劃，窺測時機，隨時準備將維新事業拋入血泊之中。正在此時，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以「個人游歷」的身份由天津來到北京。榮祿等「神色慘沮」，憂心忡忡，生怕革新勢力與外國人要結合起來，局面複雜，禍起肘腋。而康有為等人卻欣喜雀躍，更加深了聯日的幻想。七月二十九日（九月十四日）伊藤博文抵北京，與維新派人士頻相過從，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甚至於私邸「夜宴伊藤」。當時，在康有為等人借用異國人才以舉新政及聯結與國方針的影響下，不少傾向變法的官吏紛紛向光緒帝獻策，建議「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為顧問官，優以禮貌，厚其饋贍，持此議者甚多。」一個名叫

陳時政的候選郎中於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

日）上書，頗能反映維新派「楚才晉用」的觀點。該摺聲稱：「頃聞伊藤罷相來遊中土，已至京師，將蒙召見，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師，著其參預新政，自於時局更多裨益。」光緒皇帝亦決定於八月初五日（九月二十日）召見伊藤博文，並且由張蔭桓擬好了「問答節略」，他們甚至有計劃於八月初八日（九月二十三日）邀請傳教士李提摩太「引見就顧問職」。

光緒皇帝與維新派的這些活動及安排，使得慈禧、榮祿等人惶惶不安，如坐針氈。他們決計要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趕在光緒帝與洋人直接接觸之前，採取措施。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御史楊崇伊迫不及待地向慈禧呈遞密摺，請求即刻訓政。楊崇伊，字莘伯，係李鴻章之姻親，又為榮祿之耳目鷹犬，他在密摺中指控維新派「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貽誤宗社」。楊氏危言聳聽地說：「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在京，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

讓人。臣身受國恩，不忍緘默，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太后追溯祖宗締造之艱，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訓政，……皇上仰承懿訓，天下可以轉危為安。」

楊崇伊密摺是榮祿等人一手策劃，並由奕劻直接「轉達頤和園」的。其行蹤詭秘，並違背通常遞摺程序，甚至連《隨手登記檔》都絲毫沒有記載。這一密奏的出發點是在於防止光緒帝與伊藤博文等人「串通」。守舊派認為：伊藤已定於初五日謁見。俟見，中國事機一泄，恐不復為皇太后有矣。不言而喻，守舊派此時已做好發難的一切準備工作，決心要敦促慈禧在初五日（九月二十日）光緒與伊藤見面前，採取非常措施，以防事出意外。

光緒皇帝遭到囚禁

八月初四日（九月十九日）傍晚，古都北京氣氛緊張，風雲變色。慈禧一伙改變了初六日（二十一日）回宮的計劃，急急忙忙



①戊戌政變三個主要人物，右起：保皇黨領袖康有為、光緒皇帝、梁啟超。

②戊戌政變時康有為上書皇帝的奏議之一。

工部主事臣康有為跪
奏為推行新政請
御門誓衆開制度局以統籌大局革舊
圖新以救時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海濱下士才識闇愚
皇上過聽人言破格
召對寬其慙直待以優容臣自顧何人
過承知遇並蒙
聖恩許令將面對未詳者准具摺條陳並
將著書進上又蒙
恩旨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
走隆天厚地誠非小臣所當被蒙感
激
天恩灰骨莫報方今國勢危感朝不及夕

趕回大內，將光緒囚禁於瀛台涵元殿。盡管第二天光緒帝仍同往日一樣，召見臣工及伊藤博文，然而，已處於慈禧的嚴密監視之下，此時的天子已失去人身自由。

這次政變是榮祿等反對變法的勢力密謀策劃的結果，它導致了變法的失敗及維新志士的被殺戮。政變所涉及人物與事件極為複雜。以下僅就與康有為變法奏議有關的問題，略作探討。

首先應該論及的是，戊戌政變的發生與康有為保舉袁世凱，並慫恿袁世凱包圍頤和園，執殺慈禧、榮祿有着直接的聯繫。

御史楊崇伊於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呈請太后還宮，但是，如果僅有楊崇伊的密奏及伊藤博文的來訪，似乎還不能促成慈禧的勃然大怒，乃至囚禁光緒皇帝的舉動，蓋其中應有更為重要的事情，觸怒了慈禧。而袁世凱的告密則很可能是觸怒慈禧的導火線。

康有為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十二日）代徐致靖草摺薦袁後，光緒帝很快召見，並委以兵部候補侍郎的重任，因為光緒帝「以變法故，自知不容於太后，結怨諸臣，浸潤於己。其最甚者，榮相、慶邸為最，瑞邸、剛相等次之。……今見事迫，乃召（袁）來京，將厚結其心。召見後乃有擢用侍郎之旨」。不難看出，光緒拔擢袁世凱的目的，是為了「天津閱兵時保護之地」，以對付后黨的突然襲擊，在這一點上光緒與康有為的心是

相通的。

然而，光緒對袁世凱的破格拔擢，更增加了康有為倚賴袁世凱制服后黨的幻想。參與這一事件的畢永年的日記，提供了可靠的證據。畢永年說：

「八月初一日，僕見譚（嗣同）君，與商此事（按指圍頤和園）。譚云：『此事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而我亦決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夜八時，忽傳上諭，袁以侍郎候補，康與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絕曰：『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康即起身命僕隨往其室，詢僕如何辦法？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但當定計而行耳。然僕終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於几間取袁所上康書示僕。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云：『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謂僕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僕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僕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何如？』僕曰：『僕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異志，非僕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后而廢之可也。』……正談之時，而康廣仁、梁啟超並入坐。梁曰：『此事兄勿疑，但當力任之也。然兄敢為此事乎？』僕曰：『何不敢乎？然僕當熟思而審處之』

，且尚未見袁，僕終不知其為何如人也。」梁曰：『袁大可者，只但允此事否乎？』僕此時心中慎籌之，未敢遽應。」

危險又錯誤的決策

畢永年是康有為等人選中的協助袁世凱包圍頤和園執殺慈禧的重要當事人，所述真切可信。它充分證實了在反對變法勢力磨刀霍霍，準備發動政變前夕，康有為卻把袁世凱的新軍當作挽救危難的唯一可靠的力量，盡管譚嗣同、畢永年等人都認為「此事甚不可」，袁世凱「極無膽」，絕非可以擔當此等大事的人選，並爭之再三，康氏兄弟及梁啟超卻固執已見，以為可以回轉天地挽救皇上的「只此一人」。這種對客觀形勢的錯誤估計，導致了維新派鋌而走險的錯誤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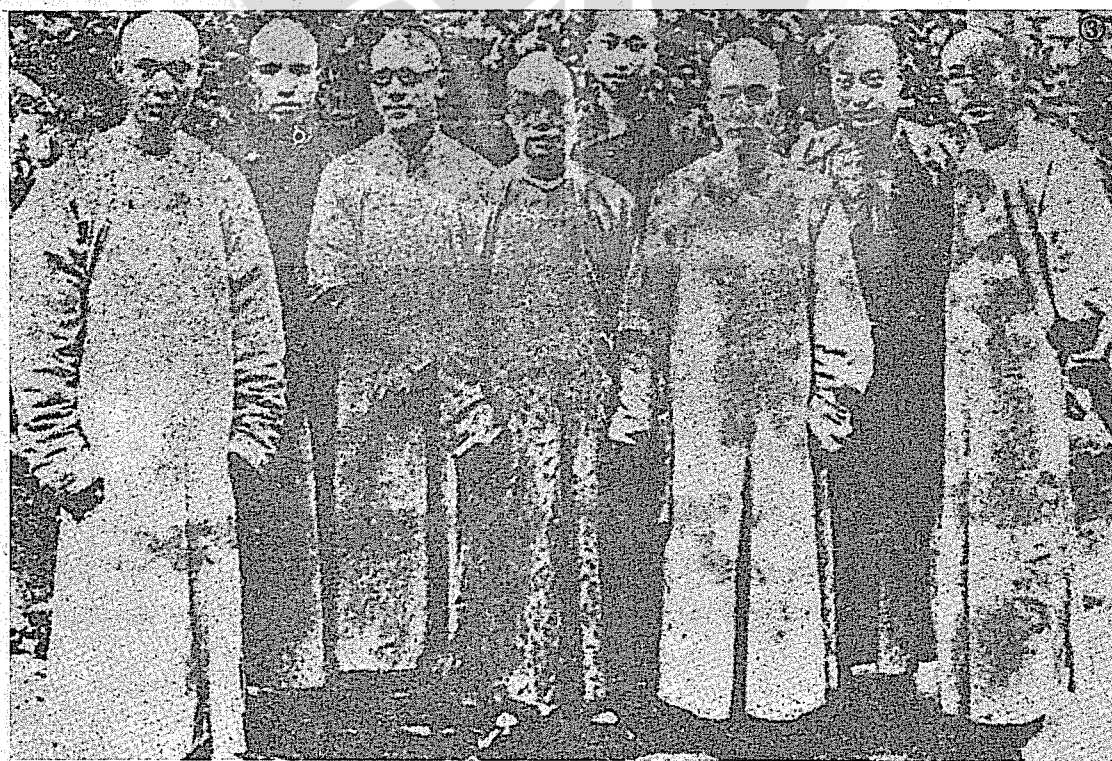
八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光緒帝頒布明詔，敦促康有為出京，前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並稱：「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責任不為不重……着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光緒帝頒發此詔用意至為明顯，說明他在舊黨的壓力下，不得不促康氏出京，以圖緩和局勢。因為當時樞臣皆認為「康不得去，禍不得息也」。光緒似乎已經感覺到康氏在京會惹出更大的麻煩，局面更不



①戊戌政變前提出合邦建議的康有為。

②任北洋大臣時的袁世凱，反對改革，使維新失敗。

③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左二）與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們合影。



好收拾，故而有此論旨。

然而，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光緒帝所料。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早上林旭傳來了光緒帝七月三十日（九月十五日）所頒密詔，康、梁諸人「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林敦谷持還繳命。」黃彰健先生認為：「此所謂誓死救皇上，亦係與康偽作的求救密詔相配合，不可信。」其實，這是對康氏原意之誤解，康氏所謂的「救皇上」，不僅僅是指出國求救，更主要的是指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據畢永年《詭謀直記》記載：

「初三日，但見康氏兄弟紛紛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時，錢君（按，名維驥，湖南寧鄉人，畢氏舊友，時往南海館，且與永年同室）告僕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僕曰：『兄何知之？』錢曰：『頃梁君謂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語。然則此事顯然矣，將奈之何？』僕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為成濟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譚、梁一夜未歸，蓋往袁處明商之矣。」

不難看出，康有為已將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當作「救皇上」的唯一指望。畢永年說康、譚、梁諸人「一夜未歸」。而這一夜正是決定維新志士命運至關重要的一夜。康有為自以為保薦袁世凱有恩於袁氏。袁世凱

到京後又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之誓言，於是，康有為對袁世凱的顧慮消除，決定公然出面說服袁世凱出兵圍園，剿殺慈禧。但是，康有為兄弟及梁啟超諸人，並不親自出馬，而是把認為「此事甚不可行」的譚嗣同推到前台，要譚「入袁世凱寓所，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蓋以譚為「天子近臣」，故由其出面，而梁啟超則「至金頂廟容純齋處候消息」。

譚嗣同的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會談的結果並不理想。袁世凱只是推宕說等到天津閱兵時，皇上馳入袁營，「傳號令以誅奸賊」。並稱：「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袁世凱老奸巨猾，並沒有答應立即派兵包圍頤和園。而且，維新派諸人有一個錯覺，總認為政變要到天津閱兵時方舉行，他們並不知道政變之謀，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目的並未達到，但卻把康有為包圍頤和園誅殺舊黨的計劃和盤托出。

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的事件，它促成了袁世凱向榮祿慈禧的告密及戊戌政變的發生。

袁氏告密造成政變

關於戊戌政變的導火線究竟是不是袁世

凱告密，史學界頗有爭議。黃彰健專門撰文考訂謂：「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房德鄰亦持同樣觀點。他們的主要依據是，戊戌政變如果是由袁氏告密而爆發，那麼，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的上諭就應提到下令捉拿游說袁世凱的要犯譚嗣同。既然清廷只是稱：「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着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拏交刑部，按律治罪。」清廷直到八月初九日（九月二十四日）才頒諭捉拿譚嗣同，說明政變的爆發，應在袁氏告密之前。

對於黃彰健先生的考訂，我是始信終存疑。現在看來，政變的爆發很可能係由袁氏告密而引起的。其理由如下：

其一，慈禧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頒訓政之詔，且因禁光緒帝，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的政變事件。倘無袁氏告密，無論是楊崇伊的奏摺及伊藤博文的到京，似都不可能促成慈禧的這一反常舉動。

其二，考察戊戌政變，或其他任何政治事件，既應從微觀上仔細訂正，又應從宏觀上進行考察。戊戌政變這樣一起關係到清王朝命運的大事，如果袁世凱不是在事先告密，而是在政變發生之後，才去告密，那麼，榮祿很可能把袁世凱視作康有為的同謀，而絕對不會像日後那樣寵信。更不會讓袁氏在榮祿赴京時，署理直隸總督。如果無告密之首功，袁世凱就不會有日後的飛黃騰達，

青雲直上。晚清的政治格局將會別是一番景象。

其三，袁世凱爲人狡詐，詭計多端，當時已有許多跡象表明了袁氏的告密。在八月初一日（九月十六日）光緒破格拔擢前後，他一面向維新派發誓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一面又去謁剛毅、世鐸、李鴻章、王文韶等權貴，甚至於「飯後赴慶邸府」，與守舊大臣相周旋，以表白其「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此心怍怍，殊不自安」的情懷，以討好守舊派；當他初三日（十八日）接到榮祿「傳令」和「專弁遺書」時，已知曉「英船游弋，已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明知榮祿已有預防，頗感形勢緊張，並擬「先一日詣宮遞摺，請訓後即回津。」在譚嗣同突然來訪後，他「反復籌思，如痴如病……細想如任若輩所爲，必至釀生大變，危及宗社」。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刻，狡猾的袁世凱不會不反復斟酌，採取行動的。因爲譚嗣同已找上門來，如果他不即刻採取行動，事發之後他會逃脫不了包庇「謀惡要犯」的嫌疑。袁世凱即經權衡，何去何從，他毫無疑問會當機立斷。

當時的維新派人士中，已有人料定袁世凱必定會走漏風聲，且預料殺身之禍，已迫在眉睫。畢永年就是如此推斷的。他於日記中寫道：

「初四日，早膳後，譚君歸寓，僕往詢之，譚君正梳髮，氣懨懨然曰：『袁尚未

允也，然亦未決辭，欲從緩辦也。』僕曰：『袁究可用乎？』譚曰：『此事我與康爭過數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無可奈何？』僕曰：『昨夜盡以密謀告袁乎？』譚曰：『康盡言之矣。』僕曰：『事今敗矣，事今敗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見公等族滅耳，僕不願同罹斯難，請即辭出南海館而寓他處，然兄亦宜自謀，不可與之同盡，無益也。』……初五日，天甫明，僕即往南海館探之，康已出京矣。探譚君則已遷寓劉陽館。」

畢永年的日記中，有一處漏洞，即稱「康盡言之矣」。因爲夜訪法華寺的是譚氏本人，康何能言之？無疑是失誤。不過，畢永年推斷，袁氏必將洩密，大禍不日臨頭，則是「不幸而言中矣」。斟酌當時情況，袁氏告密，極有可能。

袁氏告密之事，非同小可。故晚近史家均有探究，如丁文江、趙豐田曾經分析道：

「六日的政變是不是因爲袁項城洩露了密謀才爆發的，還待考證。同時假定是他洩露的話，他在京師洩露的，還是在天津洩露的，或是在兩處都洩露了，也不能說一定。不過我據各種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從譚復生的口裡聽到南海全部計劃，西后以初四日酉刻還宮，初五日德宗在召見袁氏以外，還延見日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京，當日晚事件就爆發了。」

戊戌政變神秘人物

丁文江等人的這些推斷，雖然不盡可信，但是，他們提到袁氏的告密是在京，還是在津，抑或兩處都洩露了，實在是很有見地的。長期以來，人們以袁氏的回津已在初五日傍晚，而政變於初五晚（或初六日早）爆發，即使袁氏告密也不會如此之快地傳到北京。這樣一來，似乎袁氏告密之說，很難成立。但是，我這裡要提出戊戌政變中一個非常神秘的人物，這就是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徐世昌，字菊人，原「爲天津世族，祖官南河河工通判」，戊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已丑留館授編修。世人謂其「深沉過於世凱」。徐世昌同袁世凱關係極爲密切，彼此無話不談。這種關係亦可由其頻繁往來函件中，略窺一斑。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一八九六年七月十日）袁氏致徐世昌之密信稱：「菊人大哥大人賜鑒：春間兩奉手書，拜聆感甚。仲夏赴都，方期把晤暢敘。適值歸省；尚欲稍待，又爲人一棒呵出。未得一晤，悵不可言。出京後即忙大差，差後又抱久病。始則頭眩心跳，繼則感櫻時疫。兩旬來心神恍惚，志氣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軍事實無心詳述。吾哥勢難自便，已聞巽之詳告。惟不得時承教益，悵憾交深，姑待時會。……日間擬赴津。匆匆。此請升安

如弟凱頓首。」

袁世凱寫此信時，正是他被御史胡景桂彈劾之後未久，故信中有謂「頭眩心跳」，「心神恍惚，志氣昏惰」，往日夙志「竟至一冷如冰」云云。正反映了袁氏憂心忡忡，擔驚受怕的心理。再如百日維新期間，又有一函謂：「菊哥大人賜鑒：迭奉手書，拜悉甚慰。到津時，行宮演武廳，均未包定，計期不及兩月，殊爲焦灼。連日催商，昨日始全定局。聞九月初間來津（按，指清廷原定戊戌九月光緒帝奉慈禧於九月赴津巡幸閱兵一事），此時亟須趕造，八月內必須完工，始可不至誤事。諸公互相推諉，辦事人多，每有此弊也。相待甚好，可謂有知己之感。慶（昌）已委總辦學堂，金波委總辦營務處，嚴復會復水師，大致頗有頭緒。親縵面呈之件，大以爲然，並甚感悅。惟內廷政令甚糟（糟）。吳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銜，督理工商農三事，津上嘩然，他處亦可想見。今上病甚沉（按，指守舊派散布謠言傳光緒帝生病），有云爲百日癆，殊爲懸念。南皮（指張之洞）向不與此老通書，故各有意見，婉爲排解，少有活動，將來必可疏通，未可太急也。……在此惟奔走應酬，實屬無謂，幾乎不暇擷管。不盡之言，容俟面罄。此請

禮安

如小弟凱頓首。」

此信未署寫作具體時日，惟提到端方等人督辦農工商局之事，可知應寫於戊戌七月

十六日（九月一日）後，到袁氏赴京之前的這十多天時間內。信中提到榮祿對袁「相待甚好，可謂有知己之感」反映了榮、袁之間的關係之友善。且言及「惟內廷政令甚糟（糟）」，亦表明袁氏對百日維新並無好感。並聲稱，欲「疏通」張之洞與榮祿之間的關係，均與當時人際關係極相吻合。

信任徐世昌大錯誤

袁、徐之間函牘繁多，未可悉引。不過由上開兩函觀之，既可看出他們關係之密切，又可搞清楚袁世凱當時對變法真實的態度，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康有爲等人竟然將袁、徐二人視若知己，這就爲日後埋伏下了禍根。袁、徐關係既如上述，康有爲等人應該很清楚。因此，在康有爲保薦袁世凱並策動其包圍頤和園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的場合都可以見到徐世昌的身影。比如，當康有爲在保舉袁世凱之議初起，爲了弄清袁氏真實態度，曾派徐致靖之侄義甫（仁祿）赴小站觀察動靜，當時徐世昌即在場斡旋。王照曾謂：「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征得者模稜語耳。」這裡的「某太史」，即徐世昌。

又如，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康有爲接到光緒密詔，在「跪誦痛哭」之餘，籌劃包圍頤和園以救皇上之策，徐世昌亦在場。康氏記曰：「是日，由林墩谷交來（密詔

），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來，經劉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衆痛哭不成聲，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可見，對維新派的密謀，徐世昌瞭若指掌，對新黨的實力亦知之甚悉。康有爲之所以不避諱徐世昌，是因為他已被徐、袁二人偽裝同情新政的態度所迷惑，故而引爲起同志。正如畢永年當時所記：初二日（九月十七日）夜七時「忽奉旨催康出京。僕曰：『今必敗矣，未知袁之消息如何？』康曰：『袁處有幕友徐世昌者，與吾極交好，吾將令譚、梁、徐三人往袁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不言而喻，康有爲在最危險的時刻，對徐世昌非但深信不疑，簡直還寄於厚望。

再如，在譚嗣同受康氏之囑，於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夜晚，隻身前往法華寺，欲迫使袁世凱舉兵圍頤和園時，譚氏與袁密談，徐世昌亦在場。梁啟超之《戊戌政變記》記載，譚氏要袁「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

如前年胡景桂參劾帥一節，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升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

上述記載說明，譚嗣同游說袁氏圍圍的關鍵時刻，徐世昌亦在場，明爲幫維新派說話，實際上全是一派假話，用以搪塞、欺騙維新志士。徐世昌在戊戌政變的爆發前夕，實際上已打入維新派內部，掌握了康有爲的全部計劃，那麼，在譚嗣同於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夜漏三下離去後，徐世昌自然要與袁世凱進行一番緊張的密謀磋商，研討對策，這些都是情理中之事。袁氏的《戊戌日記》，將此情節省略不記，正是有意掩飾。正因爲如此，長期以來，史家在探討戊戌政變時，對袁世凱通過徐世昌向榮祿告密的舉動，很少予以足夠的重視。可以推想，在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夜晚之後，徐世昌一定會配合袁世凱緊急行動的。袁氏要初五日（二十日）請訓後，方可離開京師，而徐世昌則是可以自由行動的。甚至徐氏還可以通過其他親信往天津榮祿處遞送告密情報。如果上述分析有一定道理的話，那麼，袁世凱與徐世昌都可能是戊戌告密中的至爲關鍵的神秘人物。由於當時情形已是千鈞一發，袁、徐無疑會斟酌再三，當機立斷。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歷來的宮廷政變都是在極端隱蔽的情況下進行的，杯弓蛇影，變幻莫測。而且在事變過後當事人又要進行百般掩飾，毀滅滅證，以至形成千古之迷。袁世凱與徐世昌的告密亦不例外。

他們是如何將維新派的計劃洩露給遠在天津的榮祿？告密達到何種程度？譚嗣同當時還是「天子近臣」，告密時應否涉及？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也許永遠也不會有確鑿可信的材料以資佐證，因此也就不能以清廷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的上諭沒有涉及抓捕要犯譚嗣同而輕易否定袁世凱的告密是導致戊戌政變的導火線，也不能在考察政變時，只考慮到袁世凱而放過了徐世昌。

歷史唯物論提醒人們，考察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時，因果關係至爲重要。正是因爲袁世凱、徐世昌在戊戌政變的關鍵時刻，有重要表現，因此他們在事件發生後非但未被視作康黨的「同謀」，相反還備受寵信。戊戌八月初十日（九月二十五日）清廷「電寄榮祿，着即刻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着袁世凱暫行護理」。可以推想，倘若清廷在戊戌政變已完成之後，袁世凱再去告密，狡詐多端的榮祿似不會在如此緊要的時刻，將護理直督的重擔交付給袁世凱的，更不肖說在己亥、庚子之後對袁世凱的信任與拔擢了。

徐世昌在晚清的飛黃發跡，常常使一些京官感到困惑莫解。俾毓鼎在未被北洋收買

之前，曾有一段記述，略謂：「徐鞠人（世昌）前輩，以署兵部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徐係丙戌翰林，壬寅年由編修第十三人超擢司業，次年設商部擢左丞，由六品升三品。去年加副都統銜，入練兵處，以閣學候補，尋攝少司馬。三年之中，由編修入政府，遭際之隆，升擢之驟，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徐與袁慰廷制府密交，嘗參其戎幕，綸扉之拜，袁實授之。相權旁落於權臣，羽翼密根於政地，余於此有深憂焉。」

俾氏稱徐世昌升擢之快，是清朝三百年來獨一無二的，頗能說明徐氏在晚清政治舞臺上春風得意，扶搖直上的情景。人們皆知徐氏之發跡係由袁世凱的援引，但是，很少人將袁對徐的信任，與戊戌政變中共同遭遇聯係起來。

實際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倘若袁、徐二人沒有在戊戌政變建立「殊勛」，也就不會有日後的「遭際之隆，升擢之驟」。史學工作者在探究戊戌政變的原因時，難道不應該從袁、徐二人後來的「遭際」中，得到點什麼啟迪嗎？康有爲作爲戊戌維新的倡導者，爲了新法的推行，曾經嘔心瀝血，心力交瘁。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在百日維新後期推薦袁世凱的建議，實在是太不高明了。實際上，如果沒有袁世凱的告密，光緒帝的處境，新政的命運，也許會比後來的結果要好一些。